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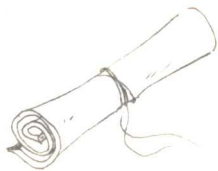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余英时文集

古学纵横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汉晋学术编年

(卷 上)

刘汝霖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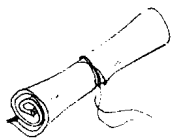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世系世

古学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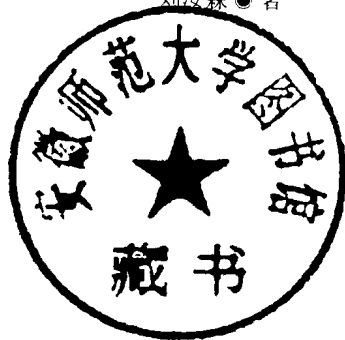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汉晋学术编年

(卷 上)

刘汝霖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缘 起

晚清以降,西学入华,华夏道术分崩离析,我国学术和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和大学教育显得更为面目不清。整顿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之世必有文治。

问题是,如何整顿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种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种种西方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又或依照韦伯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晚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两

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大道，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势必首先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养成的凡事以现代观点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和大学教育的基本品质。现代中国学术的视域基于现代西学，由于对古典西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时才会有心胸坦荡、心底踏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和大学教育正在踏上回归古典学问之路——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主义式的”论说，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基本的学问方向：悉心绎读经典大书，凭靠古典智慧来养育自己的心性。如此学问方向基于万世不绝的古典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学问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有如此心性的学人，并激励“我们”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两百年来的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

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绎读经典为核心和传统,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绎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编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文集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或文化研究一类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年10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出版说明

民国十八年(1929)夏,刘汝霖计划在已完成的《周秦诸子考》基础上,将自两汉西晋至清末民初的学术,通盘整理,编年记载,凡作六集,合为《中国学术编年》大著,以展示我国古代学术沿革盛衰的轨迹。但最终仅完成了第一、二集,即《汉晋学术编年》和《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汉晋学术编年》时间年限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4)至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 316),共七卷。193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 年中国书店收入《民国丛书》影印出版。该书征引庞博,考证严谨,对研究汉晋时期的学术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今重新编排出版,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作者在“凡例”中言明:“本书史料,杂采各处,须经选择删定,故对于原文,时有修改,总以不失原意为主。”以现今诸通行版本对校书中诸条目正文,可知其虽多有缀连删定各家史料而成者,但大率仍照录出处原文,仅人物称谓、时间表述等略有改易而已,自造

语不多,“不失原意”。然诸史料中的人名、地名等互有差异,是书照录,遂有前后不一之处。且书中颇有排印讹误,又由于缀诸家史料而以己意删定成文,亦未注明所采版本,则底本与校本之出入属版本、排印问题还是作者原意,有时未可轻作论断。

为便于读者翻检研究,现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全书原貌为准则,对全书作出整理,疏失之处,望读者鉴察指正。整理内容如下:

一、全书为简体横排,凡底本出现在人名中的异体字均予保留。

二、全书的公元纪年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

三、对于书中明显的排印讹误,径改之。作者在征引材料时未注明版本,凡与现今诸通行版本对校后,有重大出入的,斟酌文意进行取舍,出校记说明;有省文且影响文意者,斟酌补充,并加括号()以示区别。据校本考证当属作者所引版本原文有误者,保留底本原貌;对校后有出入的同义字词及不影响文意的虚词,难以判断属作者本意还是印刷讹误者,亦尽量保留底本原貌。

四、作者对同一引文出处的表述有参差之处,尽量保留原貌。

五、书中引用诸史料中的人名(如兒匡、倪匡)、地名(如洛阳、雒阳)有差异者,除出现在同一条目时斟酌统一外,均保留底本原貌。

六、标点的规范化:根据现行的标点符号用法和古籍整理通例,参照校本,对全书进行规范化标点。与现今诸通行版本对校后,有因标点出入而造成文意相异之处,则以保留原貌为主,出校记说明。

点点

2010.01.12

自序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发扬，肇自遐古，源长流远，纒緜数千载。秦火以前，书缺有间，百家诸子所述，或出传闻，或由附会，年代先后，较难辄定。自汉以还，贤哲踵起，流别至多，益以域外学说，蓁蓁而至，影响所及，洵非浅鲜，稽古之业，弥见发皇。亶亶学子，呕心敝脑，二千余年，未尝间断，成绩之优，世罕伦匹。但以典籍之繁富，渺若烟海，又复纯驳不掩，真伪杂陈，学者从事于斯，终身未窥门径者有之，误入歧途冥行忘返者有之，条贯难寻，探索匪易，是以望洋兴叹者比比也。近岁欧洲各国，渐重视东方文化。东邻日本，尤提倡汉学。国人整理国故之声，亦已喧腾数载。所苦者，事体既大，头绪较繁，分工合作，均觉不易。昧者为之，或注意琐屑，沾沾自喜，或抄袭陈言，藉充篇幅，将何以饜世人之望乎？今欲开来学之捷径，解千年之纠纷，允宜通盘计算，勒成专书，将我国自古迄今学术沿革盛衰之迹，汇为一帙，使学者一览无遗，资为伐山之斧，通津之筏，一得之愚，不忘献曝。夫友邦既示我以

瑰宝，期我以收获，我将默而不顾乎？将尽弃固有坐享他人之成功乎？此吾人所不得不努力者也。

民国十八年夏，余著《周秦诸子考》始讫，又拟将自汉以后学术，通盘整理，编年记载，一如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歙县吴检斋师深赞斯议，并锡名曰《资学通鉴》。著笔未久，而应南开大学之聘，功课忙迫，鲜有暇时。且津门书籍缺乏，检阅为艰，进展匪易，事几暂停。十九年夏，言旋北平，任职女师院研究所，方得博览典籍，广收史料，抉择真伪，考定年代，改名为《中国学术编年》。因念前人所传史体，互有短长，历代史家，视为无可如何。纪传之体，一事辄分隔数卷；纪年之体，一事则散见数年；纪事之体，一人则分见数处。补救无方，翻阅斯难。今欲兼收众美，弥补阙阕，允宜增加体例。一曰标明时代。文化演进，繁变无方，时代不同，色彩斯异。前代史家，昧于斯旨，故卷帙之分，恒依君主生卒、朝代兴亡、史料多寡为断。画分时代，既无深意，阐明演化，何由准则？汉之文、景，崇尚道术，而观轅固、黄生之争，儒家正名，反有逊于道家。武、宣之代，儒术斯倡，而酷吏之用，杂霸之说，明儒实法，昭昭甚著。怀、愍北狩，中原陆沉，牛继马后，开发东南，地域既殊，情势迥异。倘以两晋合为一谈，则失实殊甚。如此种种，不有特别标明，安能晓其背景？二曰注明出处。前人著书，每逞其渊博，凡引用前人之语，多不注明出处，致使览者检查无从，考究匪易，谬误之点，莫由指摘，杜撰欺人之徒，因而生心。故今特标“出处”一格，将直引、转引之书，注明版本、卷页、篇章，使读者得之，欲参校原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欲考究史事，鲜有因袭致误之弊。三曰附录考语。中国旧史，多重政治，集其事迹，考其年代，尚属易易。学术记载，向少专书，学者身世，多属渺茫，既须多方钩稽，又须慎其去取。故标出“考证”一格，将诸种证据，胪列于后，以备读者之参考。四曰附录图表。前后之渊源，各派之同异，往往为体例所限，分志各处，以致

读者寻检不易,故有图表之设,以济其穷:曰学者传授表,说明学者传授之次第也。曰学者著述表,总计学者个人之著述也。曰学术系统表,总计一时代各派学术或归纳诸种学术于一系统之内也。曰学术说明表,分析一派学说之内容及各部之特点也。曰学术异同表,说明各派学术之优劣异同点也。五曰附录索引。编年之体,既将各人各事,依年分志,前后相隔,检阅自难,故有索引,以济其穷:曰问题索引,乃为学术问题而设。曰人名索引,乃为考查个人而设。俱将散见各处之事迹,归于一处,志以公元,以备检查。循此纵览全书,庶可得编年之益而遗其弊矣。然人知有涯,学无止境,今之所谓是者,安知后日不以为非;己之所谓是者,安知他人不斥其谬?个人之理解,可论定于一时,而学术界之是非,虽谓之万古不决可也。倘蒙有识之士,切实整理,使斯学日趋于光明之途,则岂惟著者之幸,抑亦中国文化之幸也夫!

二十一年四月刘汝霖识于师大研究院

凡 例

一、本书所载学术史料,包涵政府、社会、个人三方面。

一、本书为整理史料便利起见,一例用文言体。惟各卷之后有总评,则用语体。

一、本书史料,杂采各处,须经选择删定,故对于原文,时有修改,总以不失原意为主。

一、本书纪年,以当代君主纪元为主,而附以甲子及公元,以便计算检查。

一、各项事迹,分志于各年之内。其后俱附“出处”一项,以明其史料之来源。若此史事之真相须经考证而得者,则更附“考证”一项。又有“附录”一项,载各种图表。

一、各学者之著述表,俱志于其卒年或最后见于本书之年。

一、事体过于琐细,或发生于本年之后而无特别叙述之必要者,则用双行小字志于本年之下。

一、各学者之事迹,不必皆与学术有关,但为考查该学者身世

起见,有不能放弃者,亦略为叙及,以资参考。

一、各学之事迹,虽分志于各年,但仍前后遥接。

一、本书各集之后,俱附有索引,以备检查。

方 法

本书既为编年体,考证年代,实为必要。而学术史料,年代先后,往往史无明文,故设有考证方法以处理之。分叙如下:

(一) 线索 古人事迹,散见各书,须精细整理,使成有系统之记载,则其人真相,方能了然。线索一法,即先将某学者史料已知年代者列为年表,然后将未知年代者,视其与已知者关系如何,列于其前或后,或置于二者之中。积之既多,即成一有系统之记载。兹列式如下:

设 A、B、C 为已知年代之史料

将与 A、B、C 有关之事迹,附于其前或后,则为:

$a''', a'', A, a', a'' \quad b''', b'', B, b', b'' \quad c''', c'', C, c', c''$

若: $a''' = b''' \quad b''' = c'''$ (即各二者所叙为一事)

则可将三式连接为:

$a''', -a'', -A, -a', -a'', -b'' - B - b' - b''' - c'' - C - c' - c'''$

再变为:

$$A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 a^{11} - a^{12}$$

例如《孟子》书中载孟子之事迹甚多，但吾人熟读《孟子》书之后，对于其人之身世，仍不甚了然，盖因其史料分散各处，缺乏整理之故也。今用此法整理，先以齐人筑薛一事为起点。齐人筑薛，有确实年代可考，在前 322 年。孟子以是年与滕文公议其事，可知孟子此时居滕。《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又载胜文公居丧时，两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丧礼。可知孟子居滕之前居邹，居邹之前游宋。再以齐人伐燕一事为起点。此事发生于前 314 年，孟子在此年与齐宣王论伐燕之事，初至齐必在其前。而梁襄王于前 317 年即位，孟子初见之后，出鄙视之言，且其书中，不复见与梁襄问答之语，盖已离此他适矣。《尽心上》载：“孟子自范之齐。”范即今山东范县，乃由大梁通临淄之路。《公孙丑下》载：“千里而见王。”可知孟子乃由梁至齐。“燕人畔”在前 312 年，同年秦、楚构兵。《告子下》载孟子、宋牼遇于石丘（宋地），议劝秦、楚罢兵之道，知孟子此时已去齐矣。《公孙丑下》又载孟子去齐时言：“予然后浩然有归志。”知孟子去齐后归邹，旋游宋国。《滕文公下》言及宋王，宋称王在前 318 年，为时后于齐人筑薛，即后于孟子居滕也，可知孟子确有二次居宋之事。复观《公孙丑下》载：“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于齐称前日，于宋、薛皆称今日，更可证二次游宋在游齐之后，但游宋不久即游薛也。鲁平公即位最晚，孟子居鲁见平公，当在游各国之后，此无须考证而知也。此为第三点。此三点相合，则可略计孟子一生游历之次序如下：

游宋，归邹，游滕，游梁，游齐，归邹，再游宋，游薛，游鲁。

（二）转证 一事发生之年代已无可考，但又有一事，与此同时发生。若将彼事年代考出，则此事亦即连带解决。兹列式如下：

设 A 为未知年代之史料

B 为 A 与同时发生之事迹

今考出 $B=P$

故知 $A=P$

例如王充游洛阳之年代已不可考,但观《后汉书·班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抚其背曰:‘此儿必记汉事。’”班固十三岁,可考知在建武二十年,故知王充游洛阳亦在此年。又如王弼为尚书郎之年代不可考,但观《魏志·钟会传》注引《王弼别传》:“是时黄门侍郎累缺,何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观《魏志·裴潜传》注,裴秀二十五岁为黄门侍郎。《晋书·裴秀传》,秀卒于泰始七年,寿四十八,故推知其二十五岁时在正始九年。王弼为尚书郎之年,亦由此可知。

(三) 剩余 一事发生之年代已不可知,但第一知此事在同一时间中不得有二,第二知此事发生年代之最大范围。可用此法,以求正确结果。即在最大范围中,将已知年代者逐渐除去,故研究范围,渐随之缩小,至于最后,所余之时间,即吾人所求者也。兹列式于下:

设 X 为未知之年代

已知条件: P 为 X 之最大范围

今以 $P=X+a+b+c+d$

则 $P-(a+b+c+d)=X$

若 a、b、c、d 俱可考知,则得最正确之年代。

若 a、b、c、d 所知不全,则 X 之范围亦可缩小。

例如夏侯胜之生卒年代,已不可知。依《汉书》考察,仅知其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复考太子太傅之职,同时仅有一人。故可画宣帝一代之二十五年为最大范围。第一,知宣帝地节三年始立太

子,以前六年,自无太子太傅,可先画除。第二,知初为太子太傅者乃丙吉。第三,知继丙吉者乃疏广。《汉书·疏广传》载,广告归时太子年十二,太子即后日之元帝也。元帝十二岁,在元康三年,是又有四年可除去者也。第四,知最后为太子太傅者乃萧望之。第五,知先于望之者乃黄霸。依《黄霸传》推算,知其为太子太傅在神爵元年,故以后十二年又可除去也。中间所余二年,可断定即夏侯胜为太子太傅之年也。《夏侯胜传》又载:“年九十,卒官。”知其卒于元康四年之末,或神爵元年之初。则其生年,当在景帝初元六七年之间也。复列表表明之如下:

宣帝在位三十五年

本始				地节				元康				神爵				五凤				甘露				黄龙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未子太傅				丙吉太傅				疏广太傅				当太子太傅夏侯胜之年				黄霸太傅				萧望之太傅				

(四) 范围 个人事迹,已不可考,即最大范围,亦不可知,唯有就其可接触或见及之事约略定其年代而已。列式如下:

设 X 为未知之年代

a、b、c、d 为所见及之事

将 a、b、c、d 之年代分别考出

若 $a < b < c < d$

则 d 为 X 之最大范围

注意:所见及或引证者以愈后而愈有效,所接触者则愈后或愈前俱有效

又式:设 X 为未知之年代

a、b、c、d、e 为与 X 有关之事

将 a、b、c、d、e 之年代考出

已知 $a > b > c > d > e$

再考 a、e 与 X 之关系

若已知 $a > X > e$

再考 b、d 与 X 之关系

若 $b > X > d$

则 X 纵不即等于 c，亦可得最小范围。

例如潘岳丧妻，史无明文载其年代。考《酉征赋》注引其《伤弱子序》，谓其子生于元康二年三月，是年岳尚生子，其妻卒于其后可知。《杨仲武诔》又载：“而子之姑，余之伉俪焉，往岁卒于德宫里。”仲武卒于元康九年，则岳妻当卒于其前。故此当中七年，可谓最大范围。又如《左传》作者之年已不可考。但观其书中所引占卜之事，有验有不验。而其时名人之预言，亦往灵验如神。其验者，必其见及者也。其不验者，必其未见者也。依此原理观之，闵二年《传》：“……初毕万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襄二十九年《传》：“吴公子札来聘，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又札至鲁，闻歌《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昭八年《传》：“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可知《左传》作者见及三家分晋（前 403 年）、田氏篡齐（前 386 年），又见及郑之灭亡（前 375 年）。再考其所不能见及者：宣三年《传》：“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周共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可知作者未见及周之亡。僖三十一年《传》：“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至秦始皇六年徙野王，已三百八十九年。文六年《传》：“秦伯任